

赵鼎新  
作品

# 民主的 限制

我所认识的赵鼎新教授，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又有社会学家的敏感。

他在立场上很难归类，也常常为庸众所误解。然而，这正是一个社会学家的本色：不向权力靠拢，也不取悦于大众，只是本着自己的学术良知，冷静地告诉世界：其实皇帝和他的造反者，都没有穿衣服。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信出版社 · CHINA CITIC PRESS



民主的限制

赵鼎新  
作品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民主的限制 / 赵鼎新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086-3518-7

I. ①民… II. ①赵… III. ①民主-文集 IV. ①D0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206329 号

### 民主的限制

著 者: 赵鼎新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 China CITIC Press )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  
( CITIC Publishing Group )

承 印 者: 北京昊天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21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3518-7 / I · 325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 自序

2004年起我开始在国内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归为三类：其一是关于中国历史形态问题，同时向读者介绍西方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其二是关于民主化问题，旨在通过我多年的治学和对东西方社会的了解，从理论上指出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特别是不成熟的民主政体）各自存在的问题，论证现代国家建立在民选政府基础上的必要性；其三是关于群体性抗争运动的研究，目的是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性梳理，并对当前中国和世界上发生的社会运动和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本书所收录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民主化和群体性抗争运动这两个方面。

在公共领域有影响力的国内学者惯于从个人所持的价值观出发来分析问题，或是“左派”，或是保守派，或是自由派，彼此之间界限分明。国内读者也有类似的阅读习惯，喜欢用这些标签来对作者及其观点进行归档。但是，如果读者从这一角

度来理解本书的话，也许就会产生困惑。国内有人称我为自由派，有人认为我是新“左派”，有人甚至戏称我是“高级五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文章中的有些结论似乎对各方都予以支持和抨击，旗帜不甚鲜明。在这儿我想说的是：如果读者带着如此成见来读这本书的话，获得的可能只是一系列误解。

这并不是说笔者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没有自己的价值立场。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绝不是一个国内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当前国内大多数较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在美国语境下都应该称作 *libertarians*。我不是一个经济自由主义者，我推崇波兰尼，并且从来就不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有明显的“左派”倾向，可是我与国内语境下的新“左派”和老“左派”毫无关系。我关心中国的前途，为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对中国的许多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感到担忧，并希望中国的下一代不再经历我们这代人曾经历过的磨难。但是，这并不是乌托邦情怀，或者说我看待具体的社会问题时有很强的现实感。我的现实感不仅仅来自于我对“文革”“极左”路线的反思，更来源于我对中国一代代“理想主义青年”的所作所为以及背后展现的人性的深入观察。我的童年生活是在上海的下层社会中度过的，“文革”期间又在宁夏当了8年工人，因此对广大劳动者的权益和所思所想有着呼吸与共的理解和同情，而与形形色色的精英优越感格格不入。但我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因为我对广大劳动阶层的弱点和可悲之处也有着深切的了解。

最后，我坚持理性精神并肯定大多数的现代价值观，但是我并不持有进步史观。我们当然要向西方学习，但是我们不应简单地把中国的过去标记为“专制”和“落后”，为了今天的种种目的而对传统进行一种非历史性的鞭挞；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代西方文化和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必要通过美化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来兜售一个从来就不完美的文化，或者构想从来就不存在也不会存在的理想国际秩序或者是理想国。在我眼里，前者表现出的是国人在近代被列强打出来的自卑和逆反心态，后者则反映了国人近年来刚富裕起来之后产生的暴发户心态。

我的现实主义立场肯定会影响我做学问时选题和提问题的方式。但是，许多时候，我的价值观与我文章的分析方式及其结论关系并不大。这是因为，在树立了问题意识后，在解答问题时我遵循的原则是让材料说话，当调查材料与我原有的价值观产生冲突时，始终以调查材料为准。这就是为什么我文章中的观点和结论在国内会引起持有不同价值观人士的兴趣、不满和误解。我做学问的这一方法并不仅仅来自于我的学术训练，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具有一种天然的道德正当性。相反，我认为一个较为完美的世界应当是各种思想和政治力量共存、碰撞和交融的结果。

我不觉得我的声音在当前中国会引起多大的共鸣，我只希望有心的读者能从中听到一种不同的声音。

## 目录 Contents

自序 // v

### 辑一 [民主]

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 // 002

民主的限制——评王绍光《民主四讲》 // 029

民主转型如何可能？——评俞可平的民主思想 // 036

“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 // 047

民主是现代国家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 // 061

现在搞民主比 80 年代好 // 072

## 辑二 [社会运动]

- 中国社会抗争 35 年来的走向 // 082
- 阶级政治还是民粹主义政治 // 092
- 伦敦骚乱 // 111
- 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 // 124
- 国内公共事件与公众参与 // 179
- 中国冲突性政治的民粹化倾向 // 192
- 追寻革命与运动背后之理 // 205
- 靠“钱”管不了社会，要靠社会自我博弈 // 228

## 辑三 [媒体]

- 霸权文化缺失下的中国新闻和社会运动 // 240
- 微博、政治公共空间和中国的未来 // 273
- 媒体、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 // 284
- 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才是正道 // 297



## 辑一 [民主]

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

民主的限制——评王绍光《民主四讲》

民主转型如何可能？——评俞可平的民主思想

“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

民主是现代国家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

现在搞民主比 80 年代好

## 民主的生命力、局限与中国的出路

民主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潮流。联合国 2002 年的年度报告指出，从 1980 年至 2002 年，已经有 80 多个国家从极权政体或威权政体转型为民主政体。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精英为实现民主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民主运动和民主政体在现代社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在成熟的西方民主社会里，人们却普遍感到民主体制的危机。在北欧一些国家，经常能看见汽车后档粘贴上写着：“对美国人要好一点儿……否则他们会把民主送到你的国家来。”虽然这一粘贴纸的主要用意在于表达欧洲民众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不满，但他们对民主的失望也跃然纸上。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民调中，人们对民选领导人普遍抱有不满意情绪，但对非民选产生的政府官员却表现出了很大的信任。在西方国家中，诸如《拯救民主》（*Saving Democracy*）和《理性选民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等学术著作不断涌现。当然，西方成熟民主社会中所出现的这些思潮和实证研究并不意味着民主体制在西方社会已经发生根本性危机，但它们却明确地揭示了西方民主的弱点和西

方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对这些弱点的的天。笔者认为，当代的民主化浪潮以及我国大量知识分子对民主的长期追求都反映了民主体制的巨大生命力，但成熟民主国家中民众对于民主的天不满却也印证了民主体制的一些公认的天不足之处。如何在民主国家转型过程中规避民主体制的弱点并发扬其优越性，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天问题。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深刻理解民主体制的生命力及其弱点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制度创新。这是本文将着重探讨的天问题。

在进入正题前，我首先说明以下几点。第一，民主是中国不少知识分子所倡导和争取的天目标，本文将阐述为什么竞争性的民主选举是现代社会中产生政府的一个更为合理的天方法，但在同时，本文也将以大量的篇幅讨论这种政府产生方式的不足之处——这似乎有点儿泼冷水的味道。尽管有些遗憾，我还是想就这一问题发表一些见解。民主本身的弱点为社会的稳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形成设置了很大的障碍，也为从威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型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民主体制的这些弱点、对民主存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情怀，民主体制的这些弱点就会被放大，从而给人民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第二，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学者的主要对话对象都是学者，他们感兴趣的是在学者之间的争论中树立自己思想的天地位；而中国学者的陈述对象却往往是国家领导人，并想通过国家领导人对自己政治主张的采纳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天抱负。作为一个在西方接受学术训练的学者，我的行为难免带有西方学术训练的痕迹。具体而

言，我想清楚地说明，虽然我应《领导者》杂志的邀请来写这样一篇似乎是为领导建言的文章，但我并不汲汲于让领导集团采纳，特别是大规模地采纳本文的观点及其隐含的政治主张。我更感兴趣的是在中国思想界树立一个不同的观点；与此同时，较为可行的社会方案往往是各种观点折冲之后的结果。我进而认为，虽然决策者的政策艺术和贯彻能力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策意图和政策结果之间的落差，但重大的社会发展往往都是决策者意料之外的结果，即使最为可行的社会方案也不会简单地等同于社会发展的实际方向。

第三，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主要是笔者在北美长期生活中所产生的一些直观感受，以及出于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及世界发展的关怀而作的一些思考。笔者不是研究民主问题的专家，西方民主理论研究领域大家如林，笔者只是偶有涉及而已，因此难免片面。我仅希望我的社会学眼光及对政治现实的感悟，能为目前中国社会中关于民主问题的热烈讨论提供一个视角。

## 民主的定义

对“民主”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将产生完全不同的讨论。国内学者对民主的理解多种多样，其中王绍光和王思睿所提出的两种迥然不同的定义极具代表性。王绍光先生在《探索安邦之道》一书中对“民主”这一概念作了界定。他强调，西方民主不是“民主”而

是“选主”，真正的民主应当是由“人民治理的制度，或更准确地说，由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的制度”；民主就是使人民能够参与到国家事务的决策中去。基于对民主的这一理解，王绍光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在目前中国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过程中，专家、传媒、利益相关集团和人民大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种决策模式的变化既是中国式民主的重要体现，也是影响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笔者同意王绍光对中国政府决策机制改变的分析，且同样认为这一决策模式的变化是中国改革持续成功的一个关键。笔者能够理解王绍光对于西方民主现状的不满，这种不满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个“左派”误区。事实上，对民主政体的不满是目前西方社会中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心态。尽管如此，笔者并不认为民主社会就是一个社会压力和政府决策咨询对国家政策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的社会，即便冠之以“中国式的民主”这一称号。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决策一般都会受到不同方面的社会压力，并且这些决策也需经过一定的、有时是很烦琐的程序和咨询。因此，如果仅仅因为社会压力和政府决策咨询对国家政策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就说这个社会是民主社会的话，那么，中华帝国社会就已经接近于民主社会了。

王思睿先生在《“特色民主”还是“民主特色”》一文中指出，选民普选制、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考核制构成了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核心。他还强调，广义的民主至少包括以下3组（共9个）概念：1）共和、宪政、法治；2）自由、民主、平等；3）博爱、善治、自治。王思睿将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和公务

员考核制纳入民主的范围，这实际上勾画出了西方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关键建构；与此同时，他提出的广义民主的这些概念，也完成了对一个完美社会的构想。这一定义的优点是抓住了民主政治的选民普选制这一关键特征，缺点是几乎将现代社会中所有理想的、正面的价值统统纳入民主的范畴，有着很大的乌托邦倾向。比如，笔者看不出为什么以选民普选制为核心的民主必定会带来作为平等思想的一个核心的经济分配的平等。俄罗斯在民主转型后并没有实现经济分配平等；拉美许多国家 200 多年来已经在民主和专制政体之间摇摆多次，但经济收入不平等在这些国家中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把俄罗斯和拉美国家中存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归咎于民主的不成熟，那么作为发展中国家成熟民主典范的印度，却同样存在着种姓、性别和经济地位等多方面严重的不平等。笔者认为，虽然许多民主国家都实行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公务员考核制和宪政等制度，但它们都不是民主的核心和本质。非但如此，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考核制是民主国家中存在的非民主成分，而国会代议制和宪法在许多国家中产生的初衷和迄今为止所起的作用非但不是为了发扬民主，而是为了限制民主范围，从而避免竞争性选举可能带来的某些负面后果。这些在美国建国初期的联邦党人文集中有着非常清楚的阐述。国会代议制、法官终身制和公务员考核制的产生，是西方一些难以阻挡民主政治潮流但又对之心存恐惧的进步保守主义思想家们（除少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外，西方主流思想家或多或少都是进步保守主义者，但近百年中国思想界独缺的就是这一思

想传统)的政治设计,是他们与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互动妥协的结果。它们的存在限制了西方民主的范围,予西方民主以现实性和可行性,从而增加了民主政体的生命力,但其本身不应被纳入民主的范畴。

在中外有关民主的众多定义中,本文的讨论基于以下定义:民主就是一个由民众在定期的、有程序和有规则的竞争性选举中选择国家执政者的政治体制。这一定义与所谓的熊彼特“最简略定义”有很大的相似性(与熊彼特的定义相比,这一定义中仅仅加上了“有程序和有规则的”这一定语)。熊彼特的定义因为没有给民主加上任何在近代观念中属于正面的社会公共物(如平等、自由、法治、博爱、善治、自治、经济发展、和平、所有公民参与决策等)而备受批判,但它却抓住了民主是竞争性选举这一最为核心的特征。熊彼特定义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自由、法治等民主社会的共同特征,但却隐含了这些特征。比如,熊彼特在定义中没有提到自由,但实行熊彼特式民主的社会中必须具备相当大的自由,否则“竞争”与“选择”将难以实现。熊彼特的定义中也不包括法治,但是熊彼特式的民主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社会,否则民主选举的程序和规则,以及在既定程序和规则下选举的公正性等都难以得到保证。熊彼特定义的另一个优点是,它没有将一些民主社会(其实可能是任何社会)难以完全实现的一些公认的社会正面特征纳入其中,从而避免了民主的乌托邦倾向。必须指出,笔者同样认为该定义有很多缺陷,本文之所以选择在这一定义的框架下来讨论民主问题,主

要是因为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是任何民主社会的核心，民主社会的许多根本性优点和缺点，以及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均系于这一根本特征。因此，讨论民主的特征必须从这一点谈起。

### 现代社会中民主的必然性

为了提倡民主，不少人给民主加上了许多它本身难以完全提供的公共物，比如平等、和平、经济发展、减少腐败等。他们把一些西方发达民主国家已达到的指标，如较为平等的社会、发达的经济、较为廉洁的政府等，完全看作是民主带来的成果，进而视之为民主本身的特征。在上文中，笔者已举出一些国家体制实现民主而经济收入却依旧不平等的例子。从理论上讲，民主和经济平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民主社会中，只有当社会中处于下层的政治力量达到较好的整合（比如产生了较强的工会，甚至是强大的代表社会下层的政党）时，民主才会对经济平等产生巨大的正面作用。与民主所伴生的自由及其他因素会促进一个较为开放的媒体和舆论体系的形成，这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官员的腐败。但是，在民主国家中，媒体的根本兴趣并不在揭露社会黑暗面上，而是在提高收视率和订阅量上，再加上种种其他原因，如人手的严重制度性短缺（市场经济下的媒体必须考虑成本）、需要和官员搞好关系（因为政府是主要新闻来源）、利益相关方为记者深度采访制造困难等，



民主社会中的媒体对官员腐败进行监督的能力受到了限制。民主造成的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也会对官员腐败形成制约，但由于众多复杂的原因，这种制约能力很有限。事实上，在目前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对官员腐败的监督主要是通过加强科层体制的有效性、建立科层内部的监督机制等非民主手段来实现的，而开放媒体和政治精英对其产生的制约则起着补充作用。这就是在许多政府科层制不够健全的民主国家（包括大多数非西方的民主国家）中官员腐败现象十分严重的原因。在这些国家中，民主与经济的关系就显得更复杂。“亚洲四小龙”是在威权体制下走向经济成功的，但迄今为止世界上尚没有一个实行民主制的第三世界国家转变为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案例。虽然目前我国仍有一些学者喜欢把民主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但国际上几乎所有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均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一定条件下的政府能力。

民主和平论也是不少学者为民主所加上的一个正面价值。其核心论点是，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确，西方民主国家之间自“二战”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军事冲突。但这种和平却是由西方社会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汲取历史教训，特别是美国在西方霸主地位的确立所带来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所谓“两个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论调，就如同说两个“北约”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一样，似乎有些滑稽。从更广泛的历史和事实来看，民主与和平的关系非常复杂。在古希腊民主下，城邦国家之间的战争从来就没有断绝过。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军事冲突就是在通过民主